

论历史类比及其他

彭年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史学界的同志们对“四人帮”采用庸俗的历史类比进行反党活动，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严肃的批判。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完全必要的。但是，许多人对历史类比（或称古今比附）似乎还缺乏具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古今比附是实用主义；也有人认为“历史类比不用为妙”；有人还提出“无产阶级完全不需要比附”；有人更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坚决摒弃历史类比的作法”。^①看来，历史类比似有被一概否定之势。然而这样做未免过于简单化，颇有因噎废食之嫌。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什么是历史类比？无产阶级能够抽象地、笼统地、一般地提出“摒弃历史类比的作法”吗？对于史学中的类比（以及对比），能够不分青红皂白，不作具体分析，一古脑儿加以否定吗？对于这个问题，应该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考察史学领域的具体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方针，虽然这是他对于如何对待民族音乐遗产问题所作的指示，但也完全适用于历史研究，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方针。我们认为运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联系当前实际，采取科学的古今比较的方法（包括对比和类比），用以说明当前斗争的实质，加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理解，指明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前途，从而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丰富他们的思想，使之更自觉地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也是“古为今用”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历史比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也是需要的，用得着的，不能一概拒绝，全盘否定。

大家知道，今天的世界是历史的世界的一个发展，“今”是从“古”发展而来的。人类历史在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出现过“历史的重演”，因而古今之间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着出现过这种情况的时候，为着更明白地了解当前的社会现象，更深刻地认识现实事物的本质，无产阶级是可以借助某些历史现象来说明现实问题的。斯大林说：“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的重演。正象从前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党人’这一名词曾使世界各国贵族胆颤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灭亡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颤心惊、深恶痛绝”^②。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为了说明“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曾经把十九世纪普鲁士的俾士麦帮助法国的梯也尔、法夫尔镇压巴黎公社，比作十一世纪法兰西骑士和诺曼第骑士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运动，也同样认为是“历史的重演”^③。

可见，重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科学地进行古今比较，是可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的。

古人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鉴者，镜子也。通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对照、比较古今的某些社会现象，看到现实事物的某种正面或反面的影子，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它们的本质。周总理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曾经把国民党反动派比作历史上的暴君和独裁者^④。“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许多同志斥之为满清皇帝的“文字狱”、蒋介石的文化“围剿”。“四人帮”捏造事实诬蔑革命老干部，正直的人们指出这是在搞“莫须有”，同秦桧陷害岳飞是一样的。可见古今比较并不都是反革命的实用主义，无产阶级也并非“完全不需要”这种以古喻今的方法。

科学的古今比较，常见的有对比和类比两种方法。

所谓对比，就是把已往事物同现今的实际情形相比较，并说明过去与现今事物间的区别，这是古今不同性质的人或事间的比较。例如斯大林曾经把列宁和彼得大帝相比，认为“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⑤。毛泽东同志更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同二千多年前孔子的“经书”进行对比，指出“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⑥

所谓类比，即比喻或比附，是在古今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事物间的比较。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美国怀有幻想”时，曾经把这种“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比作三千多年前殷商末世那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⑦。为了说明哲学的党性，列宁也曾经把古代的哲学，同当代的哲学进行类比，指出“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⑧。

当然，类比往往是跛脚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十全十美。列宁指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⑨。因此，科学的类比不是等同，不能要求进行类比的两个对象各个方面都必须具有共同的特征。三十年代，鲁迅曾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比作清朝的虐政“文字狱”和“禁书”；又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比之为明成祖的“牵牵连连”的“瓜蔓抄”^⑩，这是把国民党反动派和明清统治者的暴政进行类比，暂时地撇开了它们之间时代的和阶级性质的差异。解放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批评某些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时说，北洋军阀政府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去当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我们政府中“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⑪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仅就是否能上能下这一点上，把我们的某些干部同唐绍仪相比。但是，闹级别的干部在本质上毕竟不同于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这两者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而转移。“极为相似的东西，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⑫因此，我们在作历史类比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循“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允许作一般的历史比较的限度内”^⑬的原则。离开

这一原则，那怕似乎是向同一方向再跨越一步，也是历史比较的限度所不允许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将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同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进行了类比，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两次革命中具有“完全类似”的表现。但是，恩格斯明确指出：“十六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④这个区别就是由于时代、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不同，因而革命结局也必然不同。但是这不等于是说完全不可以进行类比。有的同志只看到经典作家对某些“庸俗的类比”、“肤浅的历史对比”的批判，而不注意经典作家曾经多次地用古今比较的方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例如有的同志依据列宁曾经指出把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杜马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立法集团相类比的作法是“可笑的”，便断言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比附^⑤。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列宁在指责罗——柯夫“作这种比较是太不严肃”和“是可笑的”之后，接着便指出“（俄国）第三届杜马很象（法国）1815年的再好也没有的议院”。如果把在法国立法集团中和在德国国会中的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作用，拿来同俄国第三届杜马中相应代表的作用相类比，列宁则认为“这样比较是可以的”^⑥。显然，列宁并不反对一切类比。他认为“可笑的”是指那种“太不严肃”的类比而已。

其实，在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中，历史上某些不同事物之间，往往具有某种相同的属性，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不同时代的某些事物进行类比，通过分析、综合，就可以推出它们的共同属性来。例如，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类比，就可以看到，一切反动阶级都具有贪婪、残忍、凶恶、阴险、狡猾、虚弱等共同属性。如果从根本上摒弃一切历史类比，不去从实际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进行分析 and 综合，比较和概括，那么许多正确的原理和概念就无法抽象出来，更不用说发现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了。

至于影射更加复杂。有人认为影射和历史类比一样，只能为反革命路线服务，不能为革命路线服务^⑦。为什么呢？没有说。也许是由于“四人帮”搞过影射史学的缘故吧！然而，我们总不能因为影射曾经同“四人帮”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见到它就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予以否定，更不能把影射划为新的禁区。我们认为，影射也是打下了阶级烙印的，不同的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用过它，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影射与影射史学是有区别的。所谓影射，是指用某些历史现象来暗示现代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社会现象。影射与类比都是以古喻今，所不同的类比是明指，而影射则是暗示。影射史学是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反科学的史学体系和史学观点。这种反动史学把影射当作自己的命根子，离开了影射它就不可能存在。一般地说，无产阶级和革命者勇于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在复杂、曲折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动势力横行的时候和地区，革命者出于策略的需要，也曾经利用过某种影射的方式，以打击敌人，教育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爱国者曾经借助痛骂历史上的汉奸如秦桧之流和歌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爱国者，来影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有理，爱国有罪”的投降主义路线，歌颂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爱国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有的革命者也曾经通过揭露秦始皇的苛政或朱元璋

的特务政治，来鞭挞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郭老写的《屈原》，通过屈原对楚国黑暗统治的控诉，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声。写的是历史的故事，骂的是古人，但十手所指的却是独夫民贼蒋介石。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革命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但是，他们仍然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其中有的就用影射的方法，以历史影射现实，揭露“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达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陶铸同志在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时，就用历史上直节忠臣的故事进行斗争。他不仅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而且还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依然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⑩。显然，这是借用抨击历史上宦官阉党擅权祸国的罪行，来影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而对范滂、范仲淹等清官的称赞，则表达了包括陶铸同志自己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四人帮”搞影射史学，革命者用影射反击“四人帮”，也许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种运用吧！

至于在革命队伍内部，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搞影射。但是，有时候由于国家民主生活不够正常，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权利，某些见解不能直说，因而有的同志采用历史影射现实或比附迂回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也是应予肯定的。曾经遭受“四人帮”的诬陷和指控、最近得到公开平反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两书就是一个例子。这两部书通过古今类比的形式，说古道今，总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坚持唯物论，批判唯心论，联系时政，切中时弊，宣传了党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有些地方还采用影射的手法来表达当时人们还不便公开提出的意见，曲折地道出了论坛上还不能明确说出的正确见解。例如作者用怀念“性格刚直”、“廉正无私”的明朝清官于谦、李三才这两个历史人物，来表达对彭德怀同志的冤案的某些不同意见。又针对当时的左倾思潮，通过批评历史上赵括、马谡的主观主义，启发人们不要“说大话，说空话”，要讲究实际，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这种为了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敢于道出别人所不敢道、言出别人所不敢言的大无畏精神，不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吗？

有的同志虽然承认用评论历史的形式，以影射的手法写成历史小品以讽刺反动势力，其革命精神应该是肯定的；但又认为“如果用于历史研究却必定是满纸荒唐言”^⑪。这似乎有点武断，亦令人颇为费解。鲁迅的杂文、历史小品、历史故事，不是有许多是“用评论历史的形式，以影射的手法”写成的么？难道这同“历史研究”毫不相干？或者“是满纸荒唐言”？不要把史学的圈圈划得太狭窄了吧！我们并不反对史学工作者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写出大大小小的专著来；但那些如匕首、投枪的历史小品、历史故事、读史札记之类，有发人智慧之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什么要拒之于史学大门之外呢？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历史类比的方法是可以用的，问题在于划清科学的历史类比，同“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以及一切庸俗的、反科学的历史类比的界限。

科学的历史类比大致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科学的历史类比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是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第二，历史科学把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探求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法，而把历史类比置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至于革命斗争中运用古今影射的方法则更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这同“四人帮”把类比当作命根子，靠影射这块“通灵宝玉”讨生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第三，科学的历史类比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以革命性为目的，科学性为基础，坚决摒弃那种为了古今类比而把古人现代化或把今人穿上古代服装的庸俗手法。

第四，科学的历史类比，不仅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差别，而且在对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时注意它们之间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强调在极为相似的历史现象之中可能产生不同的结局。这就是说，在作历史类比的时候，既要考察古今之间基本的历史联系，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从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和普遍性的结论；又要注意历史上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属性、多种多样的内容和纷繁庞杂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现今的实际。

总之，历史类比虽然是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治史方法，但往往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尽管许多人都在用它，但却怀着不同的目的，持着不同的观点，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因之，历史类比法也就有科学与反科学，合理与荒谬，严肃与庸俗的原则区别。“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应该用比较的方法、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区别实际存在着的不同的历史类比法。

注：

① 以上意见见《光明日报》1977年9月11日，1976年6月15日；《历史研究》1976年6期，1978年8期。

② 《斯大林全集》十卷209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304—305页。

④ 参看《上海文艺》1978年1期。

⑤ 《斯大林全集》十三卷93页。

⑥ 《毛泽东选集》五卷257页。

⑦ 《毛泽东选集》四卷集1499页。

⑧ 《列宁选集》二卷365页。

⑨ 《列宁全集》八卷423页。

⑩ 《两地书·序言》。

⑪ 《毛泽东选集》五卷330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九卷131页。

⑬ 《列宁全集》十卷114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卷482页。

⑮ 《历史研究》1976年6期。

⑯ 《列宁全集》十七卷302—303页。

⑰ 《光明日报》1978年6月15日。

⑱ 参看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1日。

⑲ 《历史研究》1978年6期。